

清末海軍重臣譚學衡(1871–1919)生平考論*

譚家齊[†]

一、引言

譚學衡(1871–1919)，字奕章、亦張，廣東新會棠下天鄉禮村繼龍里人。與薩鎮冰(1859–1952)、程璧光(1861–1918)等北洋艦隊戰友，同為甲午戰敗後中國海軍重建的靈魂人物。譚氏在三人中位階最高，又曾於清宣統帝(1909–1911在位)遜位詔上，以內閣「署海軍大臣」名義副署，見證中國千年帝制的結束，實在是清末民初很有建樹的重要人物。可是，當其海軍部及清末內閣同僚，絕大多數已被廣為研究或傳頌，譚學衡卻幾乎在中國近現代史甚至海軍史的著述中失去蹤影，而且他的貢獻和仕歷經常與薩鎮冰的混為一談，至今亦未有一篇完整可靠的傳記研究，交代此歷史轉折時期重要人物的生平狀況。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整理現今可見的晚清海軍資料、當時的報刊訊息，以及廣東的鄉邦文獻和譚氏家族的著述，重構譚學衡較完整的傳記，尤其注重他在清末皇族內閣時代的活動及與海軍部同仁的互動，以見他在清末海軍重建及清朝結束過程中的角色與地位。

二、海軍出身：甲午戰前的海軍學習與軍旅生活

譚學衡生於廣東新會的書香世家，其父譚國恩(字彤士，1850–1903，1886年進士)為清末漢學大師陳澧(1810–1882)的學生，進士後先任工部主事，後歷任體現對在日華人治外法權的橫濱理事，襄助駐日領事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字伯行，1855–1934)，回國後陞任廣西桂林候補知府，後轉任同省平樂府知府等職。¹光緒庚子年(1900)其友抗法英雄暨廣東知府尹恭保(字仰衡，1870年舉人，馮子材〔1818–1903〕

* 本文初稿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之「第四屆近代中國海防國際研討會」(2015年3月)席上發表，其後蒙不少前輩學者指教與提示新資料。出版審查期間，又承多位審稿人惠示資料及提出商榷意見，令文章論述更為可靠，特此鳴謝！

[†] 譚家齊，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¹ 有關譚國恩生平及其任職日本橫濱與廣西的資料，參譚家齊：〈光緒丙戌科進士新會譚國恩生平初探〉，載卜永堅、李林(主編)：《科場·八股·世變：光緒十二年丙戌科進士群體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5年)，頁565–75。

舊部)為譚國恩《寫趣軒續稿》撰序云：「譚彤士太守，予執友陳蘭甫京卿之弟子也。京卿教術最廣，得其緒餘者，均足分學海之支流焉。」²譚國恩先在廣東漢學重鎮學海堂跟隨陳澧學習漢學，爾後又在由廣東巡撫蔣益澧(1833–1874)成立、陳澧主持、創辦於1857年的菊坡精舍中繼續學業。在〈讀先師陳蘭甫京卿(澧)《東塾集》敬賦一律〉詩中，譚國恩表達了對師教的體會，並及菊坡精舍的課程與教導：

菊坡遺澤尚融融(師為菊坡精舍山長)，廿載涵濡化雨中。風鑑記曾承特賞(師嘗決同門呂君紹端、廖君廷相必中甲科，果驗。恩亦不左，惜師已不及見矣)，時文深愧負宗工(學駢體文謂可精進，而未卒業)。讀書未竟憑兒續，行己難忘到老同(師教人為學以行己有恥為主)。今日官箴昔師訓，人才學術總相通(師嘗云政治由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³

詩中除了述及譚國恩在廣州學海堂及菊坡精舍的學術淵源，「讀書未竟憑兒續」一句，更點出譚學衡等幾名兒子亦拜在蘭甫師門下，父子同執弟子禮。由此可知，新會譚氏與陳澧、學海堂及菊坡精舍的關係非常深厚。學海堂及陳澧有關的人脈，對譚國恩父子的人生亦有影響，例如百日維新的領導人物康有為(1858–1927)及梁啟超(1873–1929)師徒，便與譚國恩有故。⁴

陳澧1882年去世，當時十一歲左右的譚學衡應在菊坡精舍中讀書。菊坡精舍的教學目標與學海堂相近，乃是不以時文為本，更要求學生精通一經。不過，菊坡的課程要求比學海堂更高：「學海堂一歲四課，精舍一歲三十課。」在命題後由陳澧等碩儒講課，然後進行考核。考核閉門進行，即日交卷，對學生要求極高。⁵譚學衡與

² 甲午敗後，尹氏讀譚彤士在日本所作詩歌，尤為痛心，以為如果朝廷早知譚氏的洞見而有所防範，時局未必會如此敗壞。見譚國恩：《寫趣軒續稿》，收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773冊，卷首，頁404–5。

³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二，頁416。

⁴ 光緒二十二年(1896)八月康有為與譚國恩遇於香港，寫有〈譚彤士太守自日本還，之官桂林，遇於香港酒樓。彤士索詩，即席述舊遊送之，並示謝方山觀察二首〉：「曾作東瀛萬里遊，袖中詩卷壓滄州。順風送到桂林好，碧溜青山放晚舟。」康有為於上京前多到桂林遊玩，可見二人關係不淺。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康有為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卷三，頁82。另見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鑑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183。茅氏應未留意譚彤士在日任橫濱理事之經歷，故未發現康氏對學日本書、習日本事之意見及其與譚國恩會面之關係。事實上，康有為當時另撰一詩，表明在彤士入廣西而康有為赴京前夕，兩人過從甚密：「工部〔即譚國恩〕文章自逸才，酒樓十日共徘徊。我為之北君西笑，海上繁花一夕開。」見譚國恩(編)：《燕都投贈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藏古籍善本，索書號120948，題籤云原書為江亢虎所贈)，頁三三。

⁵ 容肇祖：〈學海堂考〉，《嶺南學報》第3卷第4期(1934年6月)，頁1–147。文中附錄「菊坡精舍攷畧」，頁144–47。譚學衡名字未見於肄業生名錄，或許他在學習中途已轉去博學館。有關譚學衡早年就學情況，因史料有限，尚待考證。不過，其父譚國恩卻在《菊坡精舍攷畧》(下轉頁125)

弟學慈除了隨父親在陳澧的菊坡精舍修業，亦於幼年時拜在姻親及鄰居伊鳴殷門下，接受啟蒙。譚國恩詩〈伊雲卿茂才（鳴殷）由粵來書以詩見示賦此寄贈〉有云：「幼兒遣就教（衡兒、慈兒嘗執贄門下），為我補義方。」⁶

兒子在菊坡精舍建立了漢學根基後，早已有志於「肆遊五州」的譚國恩，認為兒輩在漢學之外，亦須精通西洋的先進學問，於是勇敢地讓第三子譚學衡走上全新的仕進之路：在1885年將他送入廣東黃埔水師學堂的前身博學館，學習外國語文及數學。學衡二兄學裴有學生名區錫恢，於1896年寫詩讚嘆以詩禮傳家的新會譚氏，願意支持子弟投筆從戎的生涯規劃：「更有英英讀六韜，長風萬里乘波濤（謂亦張師叔）。」⁷譚學衡1887年入讀新建水師學堂的第一期駕駛班，國恩的第四子學慈也進入了同校的第三期駕駛班。課程為時兩年，要由父兄擔保中途不得退學。當時的駕駛班學習英語、天文、海道、駕駛及攻戰之法等西學，而該校初期任槍炮及英語教習的，便是留美幼童詹天佑（1861-1919）。⁸每年課堂學習九個月，餘下三個月即在練船中從洋教習學槍炮、帆纜及測算等船務運作。畢業後材藝俱優者，保送外國學堂或兵船學習。⁹由於課程要求非常嚴格，博學館原有七十餘人，經考校後，「察其器識、資質、體氣之不如式者，陸續剔退」，只存三十八人。譚學衡一屆的駕駛頭班十三人（另說是十四人），¹⁰在光緒十六年庚寅八月（1890年9月）畢業。¹¹

〔上接頁124〕

舍集》所選取的人名中（見頁146）。又，菊坡精舍中人，也多同時在學海堂學習。另參李緒柏：《清代嶺南大儒：陳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117-25。對學海堂及陳澧生平志業較全面的研究，見 Steven B. Miles, *The Sea of Learning: Mobility and Ident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Guangzhou*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書中特別分析了菊坡精舍與陳澧個人志業的關係，也詳述陳氏如何以更深奧的課程及更頻繁的考核，進一步發揚學海堂及嶺南的漢學精神，見頁195-99、229-32。

⁶ 譚國恩：《寫趣軒近稿》，卷二，頁358。

⁷ 譚國恩：《燕都投贈錄》，頁三八。

⁸ 見劉傳標（編纂）：《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69。另參胡立人、王振華（主編）：《中國近代海軍史》（大連：大連出版社，1990年），頁93-95（王振華撰寫）；吳守成（主編）：《海軍軍官學校校史（第一輯）》（高雄：海軍軍官學校，1997年），頁27-28。

⁹ 〈張之洞奏創辦水陸師學堂摺（光緒十三年六月十四日[1887.8.3]）〉，載張俠等（合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頁398-401。

¹⁰ 〈張之洞奏辦理水陸師學堂情形摺（光緒十五年十月十八日[1889.11.10]）〉，載《清末海軍史料》，頁401-4。劉傳標《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對譚學衡等駕駛頭班訓練情況有如下記載：「由於初期學生均已不同程度地掌握了英語、算學等基礎知識，因而大大縮短了堂課的學習時間。駕駛頭班學生譚學衡等14人入學僅兩年多，即已堂課結業，登練習艦實習。學堂以『廣甲』兵船充練習船，以該船管帶劉恩榮為練船總管、船政學堂第五屆駕駛班畢業生程璧光為副總管，並委託駐英國公使劉瑞芬在英國招聘練習艦洋員正教習1名、槍炮教習1名、帆纜教習1名。」（頁69）

¹¹ 見陳貞壽：《圖說中國海軍史：古代-1955》（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86-

1888年清廷頒定〈北洋海軍章程〉，當時中國海軍成立不久，正是用人之際。譚學衡畢業後旋於庚寅年九月（1890年9至10月）被撥入北洋海軍，到天津服役。¹²按其海軍學生出身，當時安排的初職應為「把總候補戰官」。為吸引具備知識的軍官加入海軍，「海軍學生出身人員已保有文職，若不願對品改武，如遇補缺需人，其材器又適相宜者，准其通融借補」。¹³在甲午戰爭後譚學衡因赴英監造戰艦有功而得改任文職為同知銜補用知縣，就是原來海軍學校學生的安排，也是海軍學校得以吸引精英階層入讀的誘因。譚學衡之父國恩於1890年至1893年任橫濱理事，1891年回鄉公務時賦詩〈十月五日抵家是日適得男孫〉，有云：「願同乃父志弧矢。」句下夾注說：「衡兒在北洋水師練習。」¹⁴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1891年率北洋艦隊訪問日本，明年5月再次訪問日本，並於5月29日抵達長崎。艦隊中致遠及訓練船威遠兩艦，於六月初四日（6月27日）開赴橫濱，後再往神戶。¹⁵此時譚學衡適在此編隊中當差，譚氏父子兩人，便因公事於橫濱巧遇。譚國恩為此賦詩〈六月九日〔7月2日〕三兒（學衡）由北洋兵艦巡歷到此喜得相敘并勉之〉，內中講述了不少有關譚學衡的生平事蹟：

朋輩他邦會合難，況教骨肉得團樂。祇期鄉土重圖敘，何幸天涯忽洽歡。兩載已知馳夢想（庚寅〔1890〕九月余出都到津，兒因撥進北洋，亦適抵津，今始再見），一家并喜報平安（因兵艦到香港，纔回家來）。採風問俗明朝事（越日偕同船諸友往遊海軍省等處），暫息行蹤好共餐（到公使館時適晚餐）。

〔上接頁125〕

87. 該屆畢業生名錄，見〈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名冊〉，載《清末海軍史料》，頁442。另見海軍總司令部：《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姓名錄》第一輯（臺北：海軍司令部，1963年），頁43，內有載「光緒十六年八月畢業」。一些譚學衡的網絡傳記，如《維基百科》的「譚學衡」條：<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D%9A%E5%AD%B8%E8%A1%A1>，檢索日期：2015年3月10日；以及陳曉平：〈見證清帝退位的譚學衡〉，《信息時報》（2011年11月13日）：http://informationtimes.dayoo.com/html/2011-11/13/content_1528250.htm，檢索日期：2011年11月13日，都記述譚氏在廣東水師學堂畢業後，赴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進修。由於譚氏從畢業到入伍之間只有一個月左右，留英時間應不緊接黃埔畢業之後。鑑於格林威治海軍學院有關中國學員的資料業已失傳，不能確切考證譚學衡入學的時間，而譚氏留英學習最可能發生的時間，其實是在甲午敗後的1896至1898年，在英國監造海圻等戰艦的幾年。此詳後文論述。

¹² 譚國恩：〈六月九日三兒（學衡）由北洋兵艦巡歷到此喜得相敘并勉之〉，載《寫趣軒近稿》，卷二，頁359。詳後頁相關引文。

¹³ 〈北洋海軍章程〉，載《清末海軍史料》，頁483。有關1889年開始北洋艦隊求賢若渴的情況，見〈李鴻章奏海軍要缺揀員補署摺（光緒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89.2.20〕）〉，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59-61。

¹⁴ 譚國恩：《寫趣軒近稿》，卷一，頁351。

¹⁵ 姜鳴（編著）：《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頁185。

可知譚學衡加入北洋海軍的時間，以及他早已夢想在海軍中工作。此外，是次訪日，北洋艦隊諸軍官亦有到日本海軍省訪問，卻少有得見日本野心的情報，而且他們視察的態度頗為輕鬆，視為觀風而未見警惕之心。譚國恩接著勉勵兒子，云：

數代簪纓舊德培，家聲都自讀書來。諸兄望廁鵷鸞列，惟汝勉成貔虎才。異域見聞須日擴，威邊事業待人開。前途正好乘風去，定遠勛名或幸陪(用班侯為勉，統領船恰名定遠)。¹⁶

訪問橫濱的分艦隊只有致遠、威遠二艘，或許譚學衡就在其中之一擔任軍官。北洋艦隊的「統領船」定遠此次未有開到橫濱，不過譚國恩仍特別提及，也有可能譚學衡是在定遠上服役的，只因父親在橫濱工作而被許跟從分艦隊往訪。因未見史料記述譚學衡於甲午開戰前服役的艦隻，上述三艦的可能性仍屬最高。此外，有關譚學衡在甲午戰前的職位也未能肯定，不過在戰爭尾聲的劉公島戰役中，他在林國祥管帶的濟遠艦上，擔任「駕駛二副守備」，直到戰事結束被日軍俘虜。¹⁷

雖然海軍有助宣揚國威，但譚國恩在任職日本期間，已感到其子任職的北洋海軍有不少隱憂：「我邦興海軍，聲威漸四訖。獨惜財力艱，舉動輒多窒。」¹⁸1893年末譚國恩返國守孝後不久，翌年7月日本便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矛頭更直指其子譚學衡等服役的北洋艦隊。當時清廷正因海軍經費不足，新裝備與新艦艇沒有適時購置，令日軍船艦在航速與火力上迎頭趕上，壓倒中國海軍，這正是使北洋艦隊灰飛煙滅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海戰中殉國最烈的英雄鄧世昌，是與譚氏家族世代通好的良朋。在甲午戰前鄧世昌對時局的憂慮，以及譚國恩、譚學衡父子與鄧世昌深厚的情誼，可在〈偶檢鄧壯節公(世昌)壬辰〔1892〕來書感賦〉詩中看到：

蓬島勞高躅(壬辰夏，公巡歷東洋，敘晤數日)，粉鄉慰積忱(公居羊城河南龍尾導，甲午春偶遇歸，因過訪)。祠新瞻傑構(祠內繹思堂扁字，公前索余書)，室雅話濃陰(前有樹木)。

原來譚氏父子在橫濱聚首時，1887年以後即為致遠艦管帶的鄧世昌亦參與其中。鄧、譚兩家於廣府為鄰，後來在守制中的譚國恩也於回粵後特意往訪鄧家，更為鄧氏祠堂的扁額題字。譚國恩在詩中繼續說出甲午前夕鄧世昌的焦慮：

¹⁶ 譚國恩：《寫趣軒近稿》，卷二，頁359。

¹⁷ 詳見日本海軍軍令部：《宣誓放還在劉公島清國海陸軍職官表》。有關文件蒙陳悅先生賜示，在此鳴謝。

¹⁸ 譚國恩：〈理財〉，載《寫趣軒近稿》，卷二，頁374。

偶把邊防問，惟虞外侮臨（公蹙然謂：無事則已，海軍罔濟）。詎知時稍隔，遂有寇相侵（未及半載，倭即有事）。借釁誠猖獗，成軍費酌斟。東溝來忽忽，北艦駛駸駸。

作為海軍要員，鄧世昌在訪日期間已明白艦隊戰力大有問題，「海軍罔濟」。接著寫黃海海戰情況：

雨下聲都烈（礮彈如雨），雷轟勢欲沈（謂魚雷）。孤身先撲陣（公管帶致遠艦，獨自進擊），群帥孰同心？爭奈舟如葉，難當旅若林。報君惟一死，植節竟千尋。義氣充天地，威名震古今。始終無與並，夷夏信咸欽（外洋亦極贊歎）。

當時之所以戰敗，似在諸管帶不能同心殺敵，各自為戰。北洋諸艦沒有統一指揮來協同作戰，也是日本人戰後分析清軍戰敗的結論之一。¹⁹ 譚國恩有關戰場的描述，應來自其子的親身經歷。詩中最後一段，寫鄧氏人品儀表及與譚學衡的深厚交情：

衰典榮華衰，論才愜素襟（曩與友談及人才，於公欽佩無已）。雄姿文耀虎（儀表壯偉），餘事帖來禽（嗜翰墨，暇輒臨池，蓄圖書甚富）。竹冊榮何極，葵衷感獨深（衡兒在北洋當差，公頗器重。戰日見致遠將沈，鼓輪向前援救，為敵所阻）。披函如晤對，珍重等璆琳。²⁰

現有關於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職官最詳細的名單，載於光緒二十年（1894）夏的《中樞備覽》之中，不過卻未見有關譚學衡的紀錄，²¹ 反映譚氏在戰事爆發前離隊，戰爭爆發後歸隊。原因何在？原來是1893年11月15日譚國恩之父病故，「譚彤士丁外艱」，須由橫濱返國，²² 為人孫者亦須回鄉奔喪。譚學衡雖是武官，但文官出身，應可選擇守為期一年的齊衰之孝，而不是武官的休假百日。只是不久後因戰事爆發，譚學衡才被召回戰場，致戰事初期未露身影。受現存史料所限，暫只確定譚學衡在甲午戰爭前應未濟遠艦中服役，因此他大有可能是在濟遠管帶方伯謙（1853–1894），

¹⁹ 如譯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淺野正恭之《日清海戰史》，便有清方「既無序列，又無一定計劃，而並無指揮」、「紀律蕩然」等結論。見《清末海軍史料》，頁880–81。

²⁰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頁409–10。

²¹ 《清代縉紳錄集成》（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55冊，頁410–14。此條資料蒙陳悅先生提示，特此致謝。

²²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382。蒙古鑲白旗人延清，有詩〈承和述懷二首四疊元韻贈行〉，云譚國恩供職日本後期，「夢見高堂病裡姿，海天迢遞恨歸遲。倚閭萬種情何篤，廬墓三年禮亦宜」，因此可知彤士於光緒二十年後丁憂三載。詩載譚國恩：《燕都投贈錄》，頁二八。譚國恩在1894年丁憂返國，亦見於清朝駐日公使的記錄，見箱田惠子（編）：〈清朝在外公館員表（一八七七～九四）〉，載岡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出使日記の時代—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年），附錄2，卷末頁81、83。

因臨陣逃戰罪在黃海海戰後被斬首，才隨廣乙管帶林國祥等艦隊殘餘人員移駐該艦的。²³無論如何，開戰前居喪的譚學衡，似可藉故遠離戰場，但他仍決心返回艦隊，參與了1894年9月黃海海戰及其後的戰鬥。這種與同袍共存亡的氣節，應該令他日後享負清望，讓清廷認定他可與薩鎮冰分庭抗禮。這也反映出，當時北洋艦隊軍官的素質和士氣不容低估。

有關譚學衡在黃海海戰期間的表現，暫未發現任何直接史料，以下僅就現存資料作一估計，希望接近事實：譚學衡在正式加入戰場之初，應在致遠以外另一艘船上參與戰事，而且該船比致遠艦更遲沉沒，甚至最終捱過了黃海戰役，他才可能考慮「向前援救」。在致遠沉沒前，落在其後而終戰沒有沉沒的，只有定遠及鎮遠兩戰列艦；²⁴要鼓輪向前，譚學衡很大可能就在兩艦之一上當舵手或軍官。因提督丁汝昌在開戰時即受了重傷，而各洋員及副官相繼戰死或受重傷，這位年輕軍官便有可能在定遠或鎮遠艦得到一定的權力，才可作「鼓輪往前」的建議。是役定遠、鎮遠在劣勢作戰中仍能安然撤退，對挽救北洋海軍不致即時潰敗，貢獻不少。²⁵

當然，譚學衡也有可能在未沉沒的廣丙、來遠、平遠、靖遠或眾炮艇的其中一艘任職，事實只有待新史料浮現才可確定。²⁶無論如何，在戰爭結束時濟遠艦力戰未沉，譚學衡在艦隊投降後才以濟遠的「駕駛二副守備」為日軍俘虜。甲午戰後，其父譚國恩於1896年赴任廣西時編的酬酢詩集《燕都投贈錄》，內附《羊垣贈詩》，譚國恩同學陳葆云：「海內雄師推哲嗣（三公郎〔即學衡〕為水師中傑出之才）。」²⁷從中可窺見在粵人眼中，譚學衡在北洋海軍殘部中，受人敬重多於因戰敗而被指責。

就在黃海戰敗後和戰未定之間，曾使日本的譚國恩對時局握腕之餘，亦分析了不少清人戰敗之因，如在〈次和梁庚笙孝廉（起）春日感懷元韻〉有記：

早知瀛海暗生波，養就鯨魚十萬多（倭人練兵有年，余前在東時所目覩者）。誰任防邊謀弗及，頓教失險意云何（丁提督遊歷東洋兩次，親睹彼國情形，乃不之備，以致迭失險要，良可浩歎）？豈無壯志誇磨盾，爭奈離心似倒戈。太息古來無此局，不能戰又不能和（時和議未定）。

²³ 濟遠艦在甲午戰事中表現的最新研究成果，見陳悅：《甲午海戰》（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頁263-64。有關濟遠艦的歷史及戰鬥詳情，另見陳悅：《中國軍艦圖誌（1855-1911）》（香港：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4-48。

²⁴ 有關鄧世昌在黃海戰役的戰績，以及致遠駛到定遠之前的情況，見〈鄧壯節公事略〉，載《清末海軍史料》，頁354-56。

²⁵ 有關黃海戰役中定遠及鎮遠等艦的實戰情況，見池仲祐：《海軍實紀·述戰篇》中的「甲午戰事紀」，載《清末海軍史料》，頁320-23。該文多述管帶及傷亡軍官的事蹟，未有提及全身而退的譚學衡。

²⁶ 現今知見各部北洋艦隊的職官表，如劉傳標的《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皆缺當時譚學衡任職的記載。

²⁷ 譚國恩：《燕都投贈錄》，頁三六。

原來日人早已在備戰，而譚國恩及親到日本兩次的丁汝昌，卻未能發現日本的野心而令清廷有所戒備。開戰後全國各地「爭奈離心似倒戈」，不能互相合作共抗敵人。究竟戰爭失利根源何在呢？

茫然兵事孰知歸，舍舊圖新未可非。敵國于今休論小，將軍從此不言飛（向來輕視倭國，致有此禍。今器不適用，雖飛將軍無以為也）。請纓無路聊安拙，握算何人尚自肥（開仗後辦軍裝，仍聞有中飽，可慨之至）。肉食難忘遷徙計，輸他田舍酒盈甌。²⁸

就是說戰敗之因是不肯捨舊立新，輕視日本國小，器械不合需要（就算有不教胡馬渡陰山的飛將軍李廣等猛將在，亦無濟於事），以及貪污腐敗到極點，在激戰最烈、形勢最險惡之時，仍有中飽軍裝款項事，令國家資源不能有效地化成戰力。那些寫於注釋的戰後分析與反思，應是他與親歷戰鬥及親身體會北洋艦隊問題的兒子譚學衡等討論出來的，間接表達了譚氏父子對甲午戰敗的結論。這些對海軍敗績的意見，就是未能引進適用於中國的「器」以及中飽軍需的貪污腐敗，相信這都是後來在海軍重建中運籌帷幄的譚學衡，一心要解決的問題；而譚學衡及他的幾位兄弟，就在後來的海軍重建過程中主持軍備軍裝的採購。

三、受知鐵良：甲午遣返後士途之浮沉

譚學衡從甲午戰敗被俘遣返到宣統初年入皇族內閣前，有關他的仕歷少見記載，只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仍留在北洋海軍中為官。²⁹是年清廷委任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向英國訂購海天、海圻兩艘巡洋艦，派遣官員赴英監造，由資歷較深的林國祥帶隊，程璧光、盧守孟、陳鎮培、黎弼良、譚學衡隨行。³⁰譚國恩1897年所撰〈丁酉元日舟泊蔗木墟〉中，即在詩注中提及三兒學衡「奉總署委往英國監造兵船」。³¹這批監造人員駐在紐卡素市（Newcastle，當時譯為牛喀斯爾）的阿摩斯當（Armstrong，當時或譯為阿摩士莊）公司的考士域（Elswick）造船廠，他們的不少逸事即記在時任清廷駐英參贊張德彝（1847–1918）的《航海述奇》中。在此期間，譚學衡應在英國深造海軍知識，而有關他曾入讀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的說法如果

²⁸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頁407。

²⁹ 見黎汝謙：〈送譚彤士（國恩）太守之官粵西即用其在京留別原韻〉，載黎汝謙：《夷牢溪廬詩鈔》，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776冊，卷六，頁434。是詩作於光緒丙申，內有注云彤士「諸郎有舉孝廉及為水師官者」。

³⁰ 池仲祐：《海軍實紀·購艦篇》，載《清末海軍史料》，頁171。另見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頁243。有關林國祥帶隊的說法，出自其甥伍連德的自傳，見馬學博：〈伍連德與舉薦他歸國效力的友人〉，《黑龍江史志》2013年第12期，頁32。

³¹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二，頁416。

成立的話，最大的可能也是在這段時間入學。或因他有較新的軍事訓練，回國後更受重用。1898年，艦隻建造完成兩年多之後，由林國祥及楊聯甲負責駕駛這兩艘新軍艦回國。³²譚學衡、程璧光、盧守孟三人並沒有隨其餘各人乘坐英國客船回國，而是留守至艦隻及各人皆離開後，始於一切手續完成時，「擬乘坐日本公司輪船」。³³

雖然在英國監造戰艦令譚學衡得到同知銜補用知縣的出身，卻無法令他在北京或海軍中一展抱負。他人生的轉捩點是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慈禧太后及光緒帝面對八國聯軍入侵而避走陝西。當時北方糜爛，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1859-1916)等地方大僚主持「東南互保」，與列強保持局部和平，南方各省不少開明士紳對清廷極端失望。譚學衡卻反其道而行，1901年他在廣東番禺人梁鼎芬(1859-1919)的策動下，與為數達三十五人的進貢隊伍跟隨兩廣總督德壽(卒於1903年)，帶著大批珍貴禮品、廣東特產，長途跋涉遠赴西安，向慈禧太后「表忠心」，透過恭進方物，以示「天下歸心」。1901年4月4日，慈禧太后召見進貢隊伍，大為感動，下了一份長長的上諭表彰各人，並「升賞有差」。此事《清德宗實錄》有載：「同知銜分省補用知縣譚學衡，著分發江蘇補用；……南海縣學宮、番禺縣學宮、東莞縣明倫堂、順德縣青雲文社，著該督撫擬給扁額各一方，以示優異。」³⁴

清廷在義和團事變後痛定思痛，開展了日後稱為「清末新政」的改革事業，而重建海軍亦是新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改革大潮中，譚學衡的軍事及管理才能被滿洲當權者看中。他還沒有到江蘇任職，就因為李鴻章心腹、淮軍要員安徽巡撫聶緝槩(1855-1911)的舉薦，以譚氏「熟諳泰西兵制」為由，於同年(1901)將譚氏改派往安徽，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開辦的安徽武備學堂擔任提調。³⁵因他「曾歷外洋，能通西國語言文字」，遷任為安徽特用知縣，協助巡撫處理與英國及巴西商人採礦等商務問題。³⁶譚學衡與外人周旋的能力，除了得自外洋留學的經驗，也應得自父親「讀

³² 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頁252。張黎源先生惠予提供海圻艦下水的照片，以及英國紐卡素市報章 *Daily Journal* (28 January 1898) 對有關事件的詳細報導，特此鳴謝。惟獨譚學衡應不在照片之中，推測他是因不能親身出席，所以名字在報導裡被收入括號之中 (Commander H. H. Tan)。他極有可能當時不在紐卡素，甚或仍在留學，故未能出席如此重要的儀式。報導中提及同往英國的林國祥是 Chief of the Resident Chinese Inspectors，而程璧光 (P. K. Ching)、陳鎮培 (C. P. Chen) 是 Captain (艦長)，比譚學衡的 Commander (大副) 高一位階。

³³ 張德彝：《航海述奇》(稿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卷十，頁1291、1330。有關譚學衡留英學習的情況，仍待進一步考證與核實；不過他不是廣東黃埔水師學堂畢業後便立即留英，應較近實。

³⁴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卷四百八十，頁十五上。另參陳曉平：〈見證清帝退位的譚學衡〉。

³⁵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52307、162738號。

³⁶ 同上注，158506號。

書兼熟歐洲法」的家學熏陶。³⁷譚父國恩曾為李經方在日本之副手，與不少淮軍將領頗有淵源，³⁸這大抵也是聶緝槩提攜譚學衡的緣故。1904年春安徽成立練軍，交武備學堂畢業生訓練，譚學衡兼任練軍統帶，「飭統帶譚學衡覈實辦理，期收成效，下所司知之」。³⁹他的前任就是在1900年兼署的懷寧知縣姚錫光（生於1857）。姚氏是晚清軍事重臣，1878年擔任首任駐日中國公使何如璋的隨員，居日本多年。後受李鴻章賞識，於1886年任北洋武備學堂教習。甲午戰後入湖廣總督張之洞幕，1896年轉任湖北武備學堂提調兼自強學堂總稽查。1898年奉張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學制，次年回國後任安徽知縣、知州等職，直到1901年調職京師大學堂副總辦。⁴⁰

譚學衡得慈禧太后賞識可望大展拳腳之際，其父國恩卻於1903年身故廣西太平府知府任上，此數年間譚學衡必須守制。⁴¹只是朝廷認定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材，雖在丁憂，不能直接任文武官職，卻仍以「丁憂安徽特（試）用知縣」銜繼續在武備學堂的工作，⁴²清廷對他的倚重可想而知。

1904年奉旨密查沿海各省防務的滿族王大臣穆爾察·鐵良（1863–1938），在回京報告時痛批江南一帶的武備學堂，例如以為江南陸師學堂「惟內堂功課程度尚淺，外堂步法均欠整肅」，其他學堂也多被罵得體無完膚。鐵良報告中也對譚學衡主理的安徽武備學堂設施不甚滿意：「惜堂基係書院改建，局勢未宏，人數無多，款項不裕。」松柏後凋，在此窘境中，譚學衡的教育及領導才能，才更加倍地令鐵良另眼相看：「查該學生年少質美，習氣毫無，且動作嫻雅，彬彬有禮。布列兵旗，所擬方略，攻

³⁷ 譚國恩：《燕都投贈錄》，頁四二。

³⁸ 參譚家齊：〈清末簡易藥方集成《驗方新編》與香港的中醫藥業發展〉，載《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香港：「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委會，2017年），頁220–27。文中討論譚國恩及清末其他編印與推廣《驗方新編》的官僚學者，皆與淮系將領有關。

³⁹ 《大清德宗景皇帝實錄》，卷五四三，頁三下。

⁴⁰ 有關姚錫光的生平，見馬駿傑：〈姚錫光在甲午戰爭前後的軍事思想及活動〉，《軍事歷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149–56。

⁴¹ 現見傳記資料皆未述及譚國恩的身故時間，只知他最後一個官職是於1903年被派往中越邊境太平府，提防法國侵略。參譚家齊：〈光緒丙戌科進士新會譚國恩生平初探〉，頁565。

⁴² 譚學衡在丁憂期間仍任武備學堂提調職務，事見朱壽朋（編）、張靜廬等（校點）：《光緒朝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月二十日，頁5299、5304。前頁載譚氏為「丁憂安徽特用知縣」，後頁則載為「丁憂安徽試用知縣」。有關安徽武備學堂歷史及其與革命活動之關係，見〈安徽武備學堂的辦學與學生愛國革命運動〉，「安徽文化網」：www.ahage.net/fengyun/16557.html，檢索日期：2015年3月10日。譚學衡似乎支持武備學堂學生的愛國請願，也未積極鎮壓革命活動。學堂在譚氏陞官北京後，便在1905年10月停辦，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的思想激進，開辦幾年後就成為巡撫知府們的一大心病」。提調學堂的譚學衡深得師生擁戴，必不排斥新思想，而且去職後學堂也遭停革，更見他主理時必然早已承受巨大壓力。

守各見心思。外場各項操法，亦皆精美。該堂提調譚學衡，辦理得法。其大隊操法，即係自發口令，進退分合，秩然有序。且勤懇耐勞，素為學堂敬服。」⁴³這是鐵良證明所任得人，比多有資源更為重要的事例。

在辛亥革命及民國初建時戰功赫赫的將領柏文蔚 (1876-1947)，在自傳〈五十年經歷〉中，也說明了人生的軍事啟蒙在譚學衡主持的安徽武備學堂之中：「適安徽武備學堂，一二三班學生畢業後，無所事，提調譚學衡呈請巡撫，成立武備學堂練軍。是年辛丑〔1901〕，余乃投入充學兵。一年以後，軍學稍得門徑。壬寅年〔1902〕夏，滿清政府派鐵良視察長江，至皖檢閱武備練軍，許其成績優美，而兵士多係舉人、廩貢、秀才之優秀分子，當奏請滿清政府以學生考試卒業，發文憑焉。」⁴⁴此一見證也反映了安徽武備學堂訓練認真。從柏氏的其他自述中，也可得知譚學衡熟悉所教學生的情況，而且在政治上也頗為寬容。⁴⁵

譚學衡雖在服父喪，面對閒散的地方軍校工作，仍是較其他地方的軍校同僚更認真任事，令他在秘密審查中獲得「認真教練，勞瘁不辭」的讚揚。⁴⁶1905年譚學衡守制期滿後，原應按吏部安排派為安徽潁州府霍丘縣知縣，⁴⁷而為鐵良截留，提拔入京任職於1903年正式成立、職司籌備建立新式陸軍與海軍的練兵處，擔任軍政、軍令、軍學這三司之一的軍學司司長，⁴⁸協助處理正要在全國開展的軍校改革，以他的成功經驗草擬軍事學堂的章程，並且為陸軍、海軍的建設進行標準化及編制的改革。⁴⁹

此時被鐵良一同收羅的，還有安徽武備學堂的前任提調姚錫光。姚氏1901年便被委為籌辦中之練兵處的署軍政使副使，1906年更升任練兵處提調。此後，練兵處對陸軍及禁衛軍的發展以及海軍的籌劃，應與譚、姚等起自安徽武備學堂的學官有關。二人與張之洞關係密切，如今要聚在練兵處大展鴻圖了。

⁴³ 鐵良：〈鐵良奏密查沿海各省防務摺〉，載《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頁5304。

⁴⁴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年第3期（總第40期），頁7。

⁴⁵ 1906年柏文蔚到吉林邊地延吉充吉強軍之文幫兼馬隊總教習，奉天訓練處總辦吳祿貞受命調查邊務，調柏氏為參謀。當年7月清政府派陳昭常（陳氏與譚學衡交情不淺，同在1901年參與向慈禧太后表忠心之旅，民國後陳氏任廣東省民政長，譚氏則為廣東治河督辦）督辦吉林邊務，由吳祿貞協助。柏文蔚拜謁陳昭常時，陳引述譚學衡的說法警告柏氏：「吾聞之汝師譚亦張〔學衡字〕云，君有革命黨聲名，希望君改改老脾氣，吾人好共事矣。好在有吳幫辦，他的雄才大略當可包羅萬象也。」（柏文蔚：〈五十年經歷〉，頁11）此側面反映譚學衡不因革命傾向而阻撓學生的發展，而且多少也是革命的同情者。

⁴⁶ 《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頁5299。

⁴⁷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40800325號。

⁴⁸ 有關練兵處的成立與制度，見朱金甫、張書才（主編）：《清代典章制度辭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273-75、441。

⁴⁹ 《光緒朝東華錄》，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頁5308。

原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就讀的周作人(1885–1967)，1905年隨老師上北京參加留學考試，當時的主考官正是譚學衡。《知堂回想錄》有此記載：「我們於十一月廿五日〔1905年12月20日〕至練兵處報到後，廿八日〔12月23日〕起在軍令司考試各項學科，至十二月初二日〔12月27日〕上午這才考畢。詳細情形已經不記得了，大抵只是上午考一兩門，下午是休息吧，由軍學司長譚學衡來監考；他是廣東人，也是水師出身，與黃老師談得很投機，戴著藍頂花翎說英語，很是特別的事。」⁵⁰從譚學衡「戴著藍頂花翎」，便知他當年已是三至四品的京官了。他說流利英語，反映當時中國海軍的工作語言大概也是英語。

1906年8月11日，譚學衡與父親的日本使館舊同僚鄭孝胥(1860–1938，後任偽滿州國國務總理)在京會面，商討有關籌辦呢絨等軍需的問題。鄭氏的日記有如下記載：「夜，赴樊時勛之約於東平安王佩香家，晤譚亦張、鄧孝先。亦張乃譚彤士之子，今為警部郎中、貴胄學堂監督。久香、石秋亦在座。席罷，久香乃言：亦張以織呢、硝皮事，為練兵處出招商股，今信裕願認五十萬，練兵處認五十萬，更招五十萬，為百五十萬，而歸商辦。南商公舉余為總理，如練兵處有人則聽之。亦張明日行。」⁵¹

1905年清廷成立警部，袁世凱的心腹趙秉鈞(1859–1914)亦受命為警部郎中，不久後警部即改組為民政部。⁵²此時譚學衡在軍事上的主要工作，是集資購置火藥及軍裝物料，而鄭孝胥這位父執輩的閩籍友人，正好襄助他從南方籌款。此外，日記中也指出譚氏同時服務於「貴胄學堂」。此學堂乃1906年清廷為王公貴族在煤渣胡同建立的軍事訓練專門學校，譚學衡兼任監督，襄理學堂總辦馮國璋(1859–1919)。⁵³此兼任職務最少維持至1910年，⁵⁴期間他撰寫了有關魚雷及水雷原理，以及有關西方軍備最新發展狀況的講章，由此可見他也是海軍武器專家。⁵⁵

另一邊廂，就在譚學衡喪父之際，大權在握的北洋大臣袁世凱，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大力推薦薩鎮冰，要求將他「破格任用」，在北洋海軍中統帶各

⁵⁰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頁157。

⁵¹ 《鄭孝胥日記》，頁1052。譚學衡入海軍部工作後，有關軍需的商務工作應為其二兄學裴接手，說詳下文。

⁵² 戴均良：〈舊中國專門民政機構的設置和變化〉，《社會學研究》1987年第5期，頁88–93。有關譚學衡的警部稽查委員會任命，見〈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05年12月12日，第2版。改組為民政部後譚氏的任命情況，見〈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6年11月13日，第1版。

⁵³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6年2月14日，第1版。

⁵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188361號。

⁵⁵ 同上注，014435、014436、014437、014438號。

船，不讓外放廣東。⁵⁶雖然未可就此肯定薩鎮冰與袁世凱結為一夥，但薩氏應感激袁世凱的舉薦；而在清廷眼中他二人一陸一海，關係微妙，如生戒心亦無可厚非。鐵良之所以識拔譚學衡，很有可能是想利用這個海軍菁英來制衡袁世凱愈來愈大的勢力。

譚學衡仕途的高峰無疑是以海軍正副大臣的身份，參與清末的皇族內閣，才四十出頭便進入了大清帝國的權力核心。此時期他與閩系海軍領袖薩鎮冰的恩怨，也是他一生中最令人迷惑的部分。海軍部由籌劃到建立短短三數年間，似乎譚、薩二人在交替掌權，究竟他們是敵是友？二人關係有否影響中國海軍的發展？而且，薩鎮冰在袁世凱掌權時期即被提拔，譚學衡則與袁世凱的對頭人鐵良關係密切，又是學海堂及菊坡精舍背景的粵人，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黨聲氣互通，他是否是清廷藉以抗衡閩系甚至袁世凱的棋子？以下先鋪陳相關史實，再作詳細分析。

清廷復設海軍之議始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四月，是時委任京師練兵處提調姚錫光作《籌海軍芻議》，以為建軍的參考藍圖。⁵⁷姚與譚曾在安徽共事，而且海軍是譚氏的專長，這計劃大概是練兵處同人攜手謀劃的。原來籌辦海軍，是袁世凱電召在外的提督薩鎮冰入京主持的。不過，薩鎮冰在五月時與譚學衡、姚錫光等練兵處官員，在貴胄學堂中幾經討論仍是不得要領，薩鎮冰甚至因意見不合而「旋辭去」。⁵⁸同年六月，陸軍部內設立海軍處，為復興海軍作準備。同時姚錫光提調的練兵處併入陸軍部，而他則在1908至1909年先後陞任陸軍部的左、右侍郎。至於原在練兵處任軍學司司長的譚學衡，便在1907年的7月22日被任為陸軍部海軍處副使(當時沒有委任正使)，成為最初籌建海軍的最高領導人。⁵⁹薩鎮冰既因不能合作而離開，則對姚、譚二人的任命，可以肯定是滿族練兵處重臣鐵良的安排。當時鐵良與譚學衡的重要舉措，就是將閩人及福建地方的海軍資源集中在朝廷手上，包括將福建馬尾船廠改歸陸軍部管轄，⁶⁰並由譚學衡親往調查一切情況，⁶¹以及製訂管理各省訂購軍艦炮艇和對駕駛人員的指引等制度。⁶²

1908年，譚學衡在籌備海軍重建之餘，他的另一重要貢獻是舉薦了鼠疫專家廣東同鄉伍連德(1879-1960)任天津的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因此之故，伍氏

⁵⁶ 〈袁世凱奏薩鎮冰請破格擢用摺〉，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85-86；〈袁世凱奏薩鎮冰請暫緩赴任片〉，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86-87。

⁵⁷ 姚錫光：《籌海軍芻議》，載《清末海軍史料》，頁797-846。

⁵⁸ 同上注，頁798。

⁵⁹ 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頁263；《大公報(天津版)》，1907年7月22日，第1版。

⁶⁰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07年8月3日，第2版。

⁶¹ 同上注，22日，第2版。

⁶² 同上注，12月25日，第2版。

才有機會在1910年控制東北鼠疫疫情時大展拳腳。⁶³譚學衡與伍連德是在程璧光引介下，在貴胄學堂會面的，期間伍氏也認識了主理學堂的馮國璋。伍氏在他的回憶錄中憶述此次會面時，譚、程二人「對於時局十分緊張與憂心，但仍盡力為我的任命奔走」。⁶⁴幸好他們慧眼識英才，人類與鼠疫的鬥爭才可扭轉敗局。

宣統元年(1909)正月清廷決定大展拳腳發展海軍，在陸軍部以外另起爐灶，成立由肅親王主持的籌辦海軍事務處，⁶⁵收併原陸軍部的海軍處，並分七年大建海軍。⁶⁶在肅親王以外，只有禁衛軍的鐵良，以及與袁世凱關係密切的薩鎮冰兩名將領，被任為「籌辦海軍大臣」；譚學衡先被任為參贊，其後先後受二品頂戴及寶星的榮耀，⁶⁷更於1909年8月至1910年12月4日期間任海軍副使。譚學衡1909年間在海軍有不同職事，包括北洋海軍運輸船隊副統領、水師學堂監督、海軍處副使等。⁶⁸在職參贊期間，各界咸認為責任重大，如《大同報》云：「譚學衡之職責任重大。海軍大臣洵貝勒、薩軍門兩次出洋考查，業經奏准，公出期間，例行公牘均由參贊學衡代拆代行。茲聞貝勒奉特旨充參預政務大臣，所有例期會議，亦經商准慶邸，由譚參贊如期到處，代表會議。惟遇重大事件，仍隨時電告議覆，以昭慎重，云云。」⁶⁹可見譚學衡此時位階雖低，但得到滿州皇族重臣信任，種下他日後進入最高權力核心的根苗。

⁶³ 伍連德在回憶錄中對袁世凱倒台後，粵籍同鄉好友譚學衡為他奔走保薦擔任此醫學要職，始終心懷感激：「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我在劍橋時期的老朋友，現在的海軍將領程璧光寫信邀我到中國北方參與新建立的陸軍軍醫學堂的組建工作。然而我決定先去倫敦、柏林考察軍事醫學，在英、德逗留六個月。1908年10月到中國，恰逢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在兩天內相繼去世，袁世凱失勢被貶。我找到新任陸軍大臣鐵良（滿洲貴族），幸運的是鐵良倚重的海軍將領譚學衡是我舅父林國祥的屬下軍官，1896-99年他們一同在英國船廠監造中國軍艦。通過譚學衡的努力，我得到鐵良的接見，委任我第一個官職：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見馬學博：〈伍連德與舉薦他歸國效力的友人〉，頁32。另見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 (Cambridge: W. Heffer, 1959), p. 448。伍氏英文原書的中國人名索引，誤將Tan Hsueh-Heng的中文寫作「譚學興」（頁658）。後來南洋學會叢書中由徐民謀節譯的《伍連德自傳》（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1960年），亦承襲此一錯誤（頁81）。

⁶⁴ Wu, *Plague Fighter*, p. 267: “. . . although they were themselves nervous over the recent political changes, promised to consult others about my future.”

⁶⁵ 陳貞壽：《圖說中國海軍史：古代-1955》，頁402。有關籌辦海軍事務處之官制、財政等詳情，參《清末海軍史料》，頁890-92。

⁶⁶ 〈籌辦海軍七年分年應辦事項（宣統元年〔1909〕）〉，載《清末海軍史料》，頁100-101。

⁶⁷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卷二十，頁十一下；卷三六，頁三九下；卷三八，頁十四上。

⁶⁸ 陳予歡（編著）：《民國廣東將領志》（廣州：廣州出版社，1994年），頁444。

⁶⁹ 〈譚學衡之職責任重大〉，《（上海）大同報》第14卷第1期（1910年8月20日），頁29。

四、重建海軍：進入權力中樞與攀上海軍事業的高峰

不過數月之後，鐵良便被調往主持前一年成立的禁衛軍。⁷⁰自鐵良在海軍籌劃上去職後，原陸軍部對海軍建設的影響，便只餘下以譚學衡為首的原陸軍部海軍處官員了。由此看來，譚學衡大概代表了清末的禁衛軍系統，與薩鎮冰的北洋海軍系統，以及袁世凱的北洋軍系統，鼎足而立。三方勢力參與新海軍的發展，不免爭奪其中的主導權。

宣統元年二月丁卯日(1909年3月8日)，譚學衡與熙彥、喬樹枏、劉廷琛、吳士鑑、周自齊、勞乃宣、趙炳麟、榮慶、陸潤庠、張英麟、唐景崇、寶熙、朱益藩等(其中譚、周及趙三人更被任為南書房行走)，⁷¹分日向宣統帝及清室解釋預備立憲的原則和新政的利弊。⁷²譚學衡講解的重點為各國海軍情形及海軍歷史。⁷³他們的講義由當年在黃埔水師學堂一手提拔譚學衡的張之洞與孫家鼐刪定。由譚學衡進講此一安排，可以看到他實際上主導了海軍軍制，甚致憲政改革的重要內容，因而才由這位前學官負責將有關原則向皇族要員詳細解釋。譚學衡的講義後來製成《彙編全球海軍方略》一冊。⁷⁴由於他奏對得體，清廷明白建立海軍部的迫切需要，下令譚學衡「籌建海軍公所，將關於海軍各項卷案，移置本府。速於西城一帶，物色官有之舊府官房，稍加補葺，即行遷入，無庸大行修飾。俟海軍部成立後再圖擴充」。⁷⁵又為了讓他集中精力於海軍範疇，不用他兼顧陸軍事務。⁷⁶當時宣統帝年紀尚小，其生父醇親王載灃(1883-1951)乃充攝政王，而他對海陸軍書籍興趣甚濃，遇有疑問便向周自齊及譚學衡詢問。⁷⁷在海軍大臣載洵等於1909年11月訪歐期間，時任海軍處副使的

⁷⁰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卷下，頁2507。

⁷¹ 〈交旨〉，《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3月9日，第1版。另見〈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8月15日，第5版。

⁷²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八，頁二二上至二二下；清史編纂委員會、中國文化研究所(編纂)：《清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1年)，卷二五〈宣統皇帝紀〉，頁369。另見趙爾巽等：《清史稿》(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卷二五，頁559。

⁷³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3月31日，第2版。

⁷⁴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3月31日，第5版。據茅海建有關此批進講講義在北京故宮存檔的調查，1909年譚學衡的《軍學講義》，包括正本71件，副本9件。具體的收藏情況如下：《宮中雜件》(舊整)第216包正本68件，副本9件；第206包正本1件；《宮中雜件》(原三號樓)第30包正本2件。見茅海建：〈清末帝王教科書——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收藏的各類《講義》〉，載茅海建：《依然如舊的月色：學術隨筆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頁136-37。將來若能對此等軍學講義作系統整理，應能更了解晚清軍事改革的藍圖及譚學衡的軍事思想。

⁷⁵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7月28日，第2版。

⁷⁶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7月31日，第5版。

⁷⁷ 同上注，9月16日，第5版。

譚學衡，獲攝政王詢謀有關海軍留學事宜：「由譚副使奏對甚為稱旨，又聞譚副使退後，旋致洵薩兩海軍大臣電一道，即係攝政王面諭留學海軍之事。」⁷⁸在清廷預備立憲及相應的官制改革大政中，譚學衡因掌握西方軍事技術與制度的前沿知識，深獲清室信任而置於權力中樞。譚氏有望為中國海軍重建放手籌劃，大展拳腳了。

當時譚學衡的工作重點，就是培訓海軍人材。在安排海軍學生留學之外，或是親身到各省籌辦海軍小學，以及到福建籌建海軍學堂，或是在上海建立海軍大學堂。清廷方面，海軍部也積極研究建設新的軍港。⁷⁹在財政供應上，清廷也在考慮「酌收產業稅及增加奢華品稅」，以應付籌辦海軍的鉅額經費。⁸⁰

宣統二年七月（1910年8月），譚學衡與同在北京供職的長兄學周（時任法部主事）、二兄學裴（時以直隸試用道任陸軍部職事）、六弟學夔（時任「協軍校」）及大批粵籍官員，上疏請求恢復在中法戰爭（1883–1885）中失利而於1884年遭革職的閩浙總督粵人何璟（1817–1888）的原官。⁸¹12月，清廷改籌辦海軍事務處為海軍部，旋即任命貝勒載洵為海軍大臣，捨薩鎮冰而以譚學衡為副大臣。⁸²「為洵貝勒所最信任」的譚學衡獲委海軍副大臣，⁸³時人似乎頗有意見，清廷特地向當年九月新成立的資議院解釋：「此次譚學衡蒙簡海軍副大臣一事，確為洵貝勒、薩軍門所面保，大致謂興復海軍數年以來，一切規制，多係該大臣手訂。兼之該大臣畢業海軍專門，將來應行謀畫之事甚繁，尚須賴其籌擬，懇請特授是缺以資勸勉，云云。」他獲派的首項任務，即是「速訂《海軍司令專章》」。⁸⁴此時外訪剛回的薩鎮冰，也明白海軍的迫切任務是建設與制度，因此對譚學衡的任命也沒有明顯的異議。譚氏上任後即按朝野期望，積極地為海軍立綱陳紀，先上奏擬訂海軍大臣、副大臣品秩，視大臣為尚書一級、副大臣為侍郎一級，「以崇部制而昭劃一」。⁸⁵由此便用既有部級制度為海軍部定位，令海軍部不再是次於陸軍部的附屬機關。

譚學衡這樣扶搖直上的仕途，當然令苦苦求官未遂的士子大為妒忌，而且更不代表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很順利。是年12月26日，這位海軍副大臣在京府第不幸失火，當時的《大公報》竟以「譚副大臣之時運不齊」為題，作出如下報導：「海軍副大

⁷⁸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11月12日，第2版。

⁷⁹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2月20日，第5版；〈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8月14日，第2版。

⁸⁰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09年12月3日，第2版；〈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月21日，第5版。

⁸¹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189476號。

⁸² 姜鳴：《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1860–1911）》，頁273；〈諭旨〉，《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2月6日，第2版。

⁸³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2月16日，第2版。

⁸⁴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2月7日，第5版。

⁸⁵ 〈海軍部奏擬訂海軍大臣副大臣品秩摺〉，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23。

臣譚學衡自奉簡以來，逐日經營，應籌各政，極為得意。誰知時運不齊，突於二十六日上午十句鐘，該大臣之私第(在舊刑部街西口)不戒於火，延燒大房五間，幸由警察及各水會竭力灌救，始得撲絕，聞已損失頗巨云。」譚學衡雖在青雲路上，但輿論令他如履薄冰。此時他自身及在陸軍部工作的兄弟，還屢受袁世凱的黨羽中傷攻擊，形勢頗為凶險。⁸⁶故此家中雖遭遇了祝融之災，這位新任的副大臣卻絕不能受私事影響，繼續主持海軍部改革。火災發生不久，海軍部即規定部內各司科長，每月逢六日要與大臣副大臣開會集議公務。⁸⁷不過譚學衡確非「極為得意」，例如據說他建議讓一直注意海軍發展的淮系前粵督周馥(1837-1921)加入海軍部，卻因周氏「未懂海軍新學」而為載洵所駁。⁸⁸雖然此一報導屬可疑的「內幕消息」，但若是實情，則此建議勢必讓海軍建設的主導權，由譚學衡轉到前輩周馥之手。或許是有意退位讓賢，甚至是高處不勝寒，譚學衡似是無意戀棧驟然攀升得到的「火箭式幹部」權位；⁸⁹只是清室破格任用，令不明顯從屬於特定派系、新學出身的譚學衡，不得不繼續肩負這個重建海軍的重擔。隨後一年，他主要的工作在爭取海軍所需龐大經費，⁹⁰接管全國各地的海軍資源，⁹¹以及參與與列強商訂有關取締外國軍艦濫入內河和在中國航海的章則。⁹²此外，譚學衡也應外務部要求，跟伍廷芳及李經方等加入為新設的外務部「顧問大臣」，協助籌劃清廷的外交事務。⁹³

宣統三年三月(1911年4月)，譚氏以創制者的姿態擬定海軍部新官制，詳定部內各官吏的具體職掌。⁹⁴此後，載洵與譚學衡便將現有的海軍官員，安置在新體制之中。他們兩人分別獲得實授的「海軍正都統」、「海軍副都統」銜；⁹⁵而籌辦海軍大臣之一的薩鎮冰，⁹⁶則在袁世凱失勢後，於宣統元年五月(1909年6月)被外放到長江艦隊當統制。⁹⁷為了安撫薩鎮冰，他的品秩要比譚學衡略高一些：「海軍副都統並加海軍

⁸⁶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5月6日，第2版。

⁸⁷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2月30日，第5版。

⁸⁸ 〈諭旨〉，《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3月1日，第3版。

⁸⁹ 此升遷極速的「火箭式幹部」評價，見陳曉平：〈見證清帝退位的譚學衡〉。

⁹⁰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月4日，第2版。

⁹¹ 〈本埠〉，《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月22日，第3版。

⁹²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6月3日，第2版。

⁹³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3月30日，第5版。

⁹⁴ 〈海軍部會奏遵擬海軍部暫行官制摺(宣統三年三月二十四日〔1911.4.22〕)〉，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24-46。

⁹⁵ 《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卷四九，頁九下至十上。另見趙爾巽：《清史稿(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本紀卷25，頁569-70；〈諭旨〉，《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3月10日，第2版。

⁹⁶ 〈著載洵薩鎮冰充籌辦海軍大臣諭(宣統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909.7.15〕)〉，載《清末海軍史料》，頁96。

⁹⁷ 〈辛亥海軍起義的前前後後〉，載《清末海軍史料》，頁723。另見《清史稿》，卷一一八，頁2227。

正都統銜」。此安排應出於主理制度改革的譚學衡，從中可見他對平衡各派利益、維持海軍上下一心的努力。⁹⁸

薙髮留辮是清初以來滿州統治者強制漢人外觀的高壓政策，但在民國成立以前，譚學衡及海軍部同僚已因軍輪上有辮不便而率先剪辮。日治下出版的《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2月9日便有〈中國辮髮之末日〉的報導：「辮髮之害夫人知之矣。然自近始，內有洵濤兩邸之提倡，薩鎮冰、蔭昌、程璧光、譚學衡、吳祿貞、良弼各海陸大員之實行，外有伍廷芳、陸徵祥各使臣等之奏請，而剪辮髮問題，遂益為全國所注目。」⁹⁹可見譚學衡等人，乃是清末最早剪髮改換新裝的大臣。

除了建立制度，譚學衡在海軍建設中的重要工作，是在國用日蹙的困境下，抵住各方削減海軍經費的壓力，向歐、美、日各國購置新型軍艦及海軍軍備。¹⁰⁰雖然軍艦交付時清朝業已滅亡，而且不少清廷簽訂的合同未獲民國政府承認，而部分日本的軍艦在製成後亦無如約送交中國的新政府，不過從民初的海軍檔案中，可知譚學衡主理下的海軍部，曾向英國、德國、奧地利、日本及美國等地軍火商下訂單購置戰艦，其中尤以對美國的交涉最有利清廷海軍的發展。在民國三年(1914)的《美國願助中國推廣海軍》檔案中，述及當時民國政府與英國交惡，打算排擠在中國海軍中的英員，以及轉而向美國尋求提供海軍艦隻及訓練的意向，並且指出就在辛亥革命爆發時的宣統三年八月(1911年9至10月)，當時美國大使芮施恩致函民國國務院，云：「清政府因欲推廣海軍，請求美政府襄助。美政府已允撥派美國海軍武員充當訓練，凡中國海軍人員，均得入美國各種海軍學堂肄業，及在美國兵艦用美國軍官教練。且凡關於製造中國兵艦及其器械，一切美國政府亦允襄助。以上各節，曾于是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奉清國硃批允准在案。」¹⁰¹從中可知譚學衡等海軍部官員，在清朝風雨飄搖之際，仍能巧妙地利用列強間的矛盾，為中國海軍儘量爭取最優厚的條款。

1911年辛亥革命時袁世凱復出，在他主持下即為海軍部任命兩位「有海軍大臣資望者」：薩鎮冰為內閣海軍大臣、譚學衡為副大臣。¹⁰²不過，薩氏當時正在長江與革

⁹⁸ 見〈載洵等奏請將現充海軍要職各員分別除授摺〉，載《清末海軍史料》，頁590-92。又見〈著載洵譚學衡補授海軍正副都統諭(宣統三年二月九日〔1911.3.9〕)〉，載《清末海軍史料》，頁103。

⁹⁹ 〈辮髮之末日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44年(1911)2月9日，第3850號，第2版。

¹⁰⁰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0年12月8日，第3版；〈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2月14日，第5版。

¹⁰¹ 殷夢霞、李強(選編)：《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獻初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2冊，頁383。此外，宣統時期清朝海軍部向美國紐約貝里咸鋼鐵公司(New York Shipbuilding Company)購買飛鴻巡洋艦，並從中爭取美國海軍協助中國海軍重建的詳情，見同書第2冊，〈美國貝里咸公司訂立合同〉，頁297-304；第3冊，〈定製美工廠飛鴻巡洋艦付款〉，頁403-89。

¹⁰²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1月3日，第2版。

命軍作戰，未能到任，其職務由仍任副大臣的譚學衡署任，而且薩鎮冰更「電致內閣，藉病懇請辭職，措詞極為懇摯，項城〔袁世凱〕已有允准之意，即擬以譚學衡補正，其副大臣一缺，擬舉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充任」。由此可知，在清朝倒台前夕，譚學衡在名義及實質上，已可算是實授的海軍正大臣了。¹⁰³

迫於革命黨灤州兵諫提出的十二條政綱，晚清資政院於1911年11月3日通過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同月18日，譚學衡以署海軍大臣、廣東京官領袖的身份，帶領粵籍京官群體聯名向清廷遞上奏摺，期望朝廷早日將《重大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以定國是而靖人心」。該摺指出：「各省仍紛紛告警，險象環生。似此羣情俶擾，將治安先不能保，憲政何由實行。」在奏摺中列名的廣東京官，有資政院總裁李家駒、署理郵傳部大臣梁士詒(1869-1933)、許應騤之子宗人府府丞許秉琦、大清銀行副監督陳錦濤、度支部左參議曾習經，以及譚氏海軍部的僚屬正參領曹汝英(1870-1924)和蔡廷幹等共八十九人，陣容鼎盛。¹⁰⁴

此外，記述清末民初史事的《清季野史》和《古春風樓瑣記》，均有記載譚學衡在清室退位時的職責。清廷面臨宣統皇帝遜位的抉擇時，曾召開過一次皇族會議，恭親王溥偉等親貴極力反對，第二天還請求獨見太后陳述主張。隆裕太后卻拒絕召見，氣沖沖地說：「國家沒有事的時候，被他們鬧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得這宗地步，他們又來鬧了。我是不願意見他們的。」當太后召見內閣的時候，為了堅定太后的決心，曾對皇帝講解憲政改革的海軍大臣譚學衡，「力謂德宗首創憲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終，隱恨而歿。今太后贊成共和，則上足以繼德宗之遺志，流芳百世云云」。太后慨然回答說：「我亦知天下係公產，並非滿洲私物；但滿洲既已遺傳二百餘載，我只求德宗陵寢可以修造，皇室地位不至墜落，則亦無恨。」¹⁰⁵由於譚學衡的穿針引線，袁世凱才提出了優待皇室條例，讓太后十分滿意，最後安然地頒佈遜位詔書。

從以上筆記史料的記載，可知譚學衡在促成清朝接受革命黨的條件，讓宣統帝退位使滿清不至於與民國兩敗俱傷上，應有一定的作用與貢獻，而有關作用似乎更

¹⁰³ 劉錦藻：《清續文獻通考》(民國景十通本；北京：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9年)，卷一一六，頁2221；〈諭旨〉，《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1月17日，第1版；〈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1月23日，第5版。

¹⁰⁴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兼署海軍大臣譚學衡等奏摺〉，載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頁101-2。對此聯名請願事件反映廣東士紳對城市事務甚至國家大政，有愈來愈大話語權的分析，見梁鳳蓮：〈近代廣州士紳的來源與介入城市事務的特點〉，《探求》2017年第4期，頁22-27。

¹⁰⁵ 見胡寄塵(編)：《清季野史》(上海：廣益書局，1913年)，卷二，頁17-18；又見高拜石：〈主張禪政之隆裕后〉，載高拜石：《古春風樓瑣記》(臺北：新生報，1979年再版)，第5集，頁178。

一直被人低估甚至遺忘。¹⁰⁶總而言之，當時署任海軍大臣的譚學衡，因緣際會，與其他內閣正大臣一起，在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1911年12月6日）頒佈的清帝退位詔書上隨袁世凱副署，見證了中國千年帝制的消亡。¹⁰⁷

譚學衡在海軍艦艇工作的時間不算太長，較不少同袍又遠為年輕，為何會脫穎而出，成為滿清王室寄予厚望的海軍重臣呢？在辛亥革命前後任職清廷海軍的粵籍革命黨人陳弘毅，便分析譚學衡之所以能擔任海軍部要職，乃因朝廷有意以粵人制衡盤根錯節的閩人之故。他認定薩鎮冰或其黨羽等「海軍的當權者已開始有將海軍壟斷為一派系所專有之意」，因而拒絕讓陳弘毅等來自黃埔水師魚雷學堂的「粵校生加入北洋艦隊。後終以海軍大臣譚學衡力持正議，才讓粵生前去」。陳氏還加上了以下注釋：「譚係粵人，粵校第四期畢業，時清廷預備立憲，以譚任海軍大臣。」¹⁰⁸可見當時海軍中人已深明閩人得勢，以及清廷以「持正議」的譚學衡平衡大局的期許。

另一位背景雷同的閩籍革命黨人朱天森，點明譚氏與薩鎮冰的省籍權爭狀況，分析朝廷有意讓譚學衡打破「非閩籍不得為司令等要職」的形勢：「清海軍中福建人任高級將官者甚眾，有閩人握海軍權柄之目。海軍中有粵籍與閩籍之爭。清末海軍部成立後，清廷為暗削閩人之權，乃增粵人之勢，以便左右操縱之。於是把海軍副大臣閩人薩鎮冰出調為艦隊統制，而以粵人譚學衡由該部參贊升為海軍部副大臣，又派粵人程璧光為第一艦隊司令（協統）。但閩人把持海軍，至辛亥革命後仍然。」¹⁰⁹

從1910年海軍部成立時高級官員的省籍狀態，也可見閩粵兩省勢力的壟斷。而且，各人若非同鄉即為同學，由裙帶關係而衍生朋黨的可能性甚高，詳情可見表一：

¹⁰⁶ 近代史家沈雲龍所著《徐世昌評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頁175，也有述及譚學衡於說服清室退位中的角色，以及被人忽視的遺憾：「當日下詔遜位之情況，據清廷奏事處太監邱和追述：『清之遜位也，袁世凱遣趙秉鈞、楊士琦、蔭昌，及海軍部某侍郎四人，持上請遜位摺，期以三日。此摺置養心殿三日，隆裕始終未披閱，懵然不知為何事，亦無他人過問。及期，四人者復來催逼，乃降旨照准，四人者哭，隆裕亦哭。四人退，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見有奏國事者，乃問奏事處太監曰：今日何無國事？奏事處方告以國事已歸袁世凱，太后但請問家事可耳！乃爽然。』（見吳瀛：『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所述亦有誤，參預催逼下詔遜位者之一為梁士詒，而非楊士琦，時楊已辭職，參『梁譜』可證。至袁組織內閣後，官制上並無侍郎名稱，故所謂『海軍部某侍郎』，應為譚學衡，時已以副大臣升署海軍大臣。梁、譚固均署名於遜位詔書者，治史豈可輕忽。」不少有關清室遜位過程的公私記錄，竟少有提及譚學衡參與其中，而上引邱和的追述亦刻意隱諱譚學衡的身分。箇中原因，或是逼君退位非人臣光彩之事，邱和應為維護譚氏名聲而姑諱其名；更因譚學衡與其他公認為袁黨的閣臣不同，進言非為袁世凱張羅局面，因而不被時人列為袁世凱同夥而廁身其中。

¹⁰⁷ 〈諭旨〉，《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12月7日，第1版。

¹⁰⁸ 陳弘毅：〈北洋海軍光復記（節選）〉，載《清末海軍史料》，頁734。

¹⁰⁹ 朱天森：〈記辛亥海軍起義與閩籍海軍人物〉，載《清末海軍史料》，頁742、739。

表一：1910年清朝海軍部主要官員分析

姓名	職務	軍銜	籍貫	學歷
載洵	海軍大臣	海軍正都統	滿人	不詳
譚學衡	海軍副大臣	海軍副都統	廣東新會	黃埔水師學堂駕駛第一屆
薩鎮冰	巡洋、長江艦隊統制	海軍副都統加 海軍正都統銜	福建福州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二屆
嚴復	一等參謀官	海軍協都統	福建侯官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一屆
鄭汝成	一等參謀官	海軍協都統	河北天津	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第一屆
程璧光	巡洋艦隊統領	海軍協都統	廣東香山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五屆
沈壽堃	長江艦隊統領	海軍協都統	福建閩侯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一屆
曹汝英	軍學司司長	海軍正參領	廣東番禺	黃埔水師學堂駕駛第一屆
伍光建	軍樞司司長	海軍正參領	廣東新會	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第一屆
李鼎新	署理軍法司司長	海軍正參領	福建福州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四屆
蔡廷幹	軍制司司長	海軍正參領	廣東香山	留學英國，後入塘沽水雷學堂
徐振鵬	軍制司司長、駐滬海軍一等參謀官	海軍協都統	廣東香山	留學美國，後入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八屆
鄭清濂	署理軍政司司長	海軍正參領	福建福州	福州船政學堂製造第一屆
林葆綸	軍儲司司長	海軍副參領	福建閩侯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五屆
李和	駐英國威克斯(Vickers)船廠監造員	海軍正參領	廣東三水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一屆
林葆懌	駐英阿摩斯當船廠監造員	海軍正參領	福建福州	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第九屆

資料出處：陳貞壽：《圖說中國海軍史》，頁410-13

表一列出海軍十六位位階最高的高級將官，其中閩人七位，粵人亦是七位，可見前述非閩即粵的說法確是實情。此外，不少粵人都在福州船政學堂駕駛班中修業，亦可算有福建的關係。如此說來，清廷似乎真的需要以粵人制衡閩人。不過，譚學衡是否不二之選呢？例如，香山人程璧光在革命及民國中肩負重要任務，他無論在教學上還是在實戰經驗上，都較年輕十載的譚學衡深厚。如果清廷只為制衡閩人，大可以委程氏以重任。¹¹⁰不過，程氏的福州船政學堂背景確易令人不安。那為何不選

¹¹⁰ 程璧光是福州馬尾船政後學堂駕駛班第五屆畢業生，是第二屆畢業生薩鎮冰的學弟，似乎亦難逃閩系勢力的影響。見〈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名冊〉，載《清末海軍史料》，頁436。

譚學衡在黃埔水師學堂的同班同學、背景與譚學衡幾近相同的粵人曹汝英呢？事實上，清廷最後仍是選擇譚學衡，必然有比省籍制衡更深層的原因，而且亦與他個人的背景、特長和素質有關，不可純以省籍權力鬥爭來解說他的升遷。

除了派系與省籍的優勢，我們亦要看晚清改革時清廷需要的是哪一類人材。國家積弱不振，逢戰必敗，外釁無人敢開，敗軍之將也不可言勇，故此薩鎮冰、程璧光等帶兵衝鋒陷陣，指揮艦隊往來殺敵的統帥之材即時並無大用，還是由他們守在艦隊中枕戈待旦吧！清廷需要的是建設一隊強大的海軍，讓未來有可供薩、程等一類猛將驅使的、有機會戰勝日本等列強的現代化勁旅，這才是當務之急。在船艦監造、海軍訓練及官制規劃上極有才幹，而且忠於職守的譚學衡，便正是清廷建設新海軍所需的新型官僚。當然，正規學校出身而有實戰經驗的人材也不只一人，譚學衡的優點還有以下數項：

一、譚學衡昆仲之中，不只四弟學慈也讀廣東水師學堂且同任北洋海軍，六弟學夔（別字典虞，1880–1916）亦在軍中任職。譚學夔早年考入廣東武備學堂第一期，1905年秋獲兩廣總督官費留學日本，先入日本陸軍成城學校完成預備學業，繼入日本福岡陸軍第十二聯隊砲兵大隊實習，1906年1月考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五期砲兵科。就學期間，日本軍事當局規定中國學生迴避「特殊教育」的授課，但學夔為盜取日軍訓練課程要籍，發起與其他二十多名中國同學，竊取訓練長官室秘本，抄寫之後將資料送東京鄉人蕭嘉祖「廣昌和」料理店收藏。此事其後被揭發，轟動一時，日本軍方本擬將二十多名學生處以死刑，經疏通後特赦，驅逐出境。後來學夔再入日本陸軍砲工學校，畢業後歸國便加入了鐵良主理的禁衛軍，任職參謀。¹¹¹無論學夔是否因其兄引薦而加入禁衛軍，鐵良對譚學衡極其信任確是無可置疑的。為譚學夔撰傳的梁啟超，指出在辛亥革命時，「禁衛軍多旗籍人，勢將負固。公苦心調護陳導，卒效順」。¹¹²1911年前後梁啟超與譚學衡同事，任職內閣法部副大臣，必然對譚氏兄弟分別在皇太后及禁衛軍兩層次遊說，讓清廷和平地交出政權的貢獻，有深刻甚至親身的體會。

二、梁啟超對在戊戌政變中出賣光緒帝的袁世凱似乎仇深似海，而鐵良一派的譚學衡，又是梁啟超的廣東新會同鄉，也同有學海堂及菊坡精舍的淵源，更因譚國恩的緣故，彼此應早已認識。由是觀之，譚學衡入閣亦有一層以廣東學海堂的清流力量、抗衡奸雄袁世凱的用意。

三、清末內閣首任漢人協理大臣徐世昌（號菊人，1855–1939），原來是譚學衡父親國恩的同年進士，兩人常有詩詞唱和，頗有交情。譚國恩〈為徐鞠人同年（世昌）

¹¹¹ 參陳予歡（編著）：《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將帥錄》（廣州：廣州出版社，2013年），頁471–72。譚學夔在民初政局也有一席位，其生平略見梁啟超：〈新會譚公略傳〉，載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12冊，頁25。

¹¹² 梁啟超：〈新會譚公略傳〉，頁25。

題北江舊廬圖》一詩的注解，記述他為徐世昌的畫題字，顯示兩人有同年之誼，在北京常相過從：「我亦嘗過訪，相與共談讌。花時良足娛，雪夜且忘倦。」¹¹³雖然徐世昌後來傾向支持袁世凱，但作為故友子姪的譚學衡，與這位內閣協理大臣，應能和平相處甚至有所呼應，此自是其他海軍同僚難有的人脈優勢。

在前引《古春風樓瑣記》中，有一篇詳述甲午戰爭的〈劉公島上弔丁祠〉，裡面提到宣統二年海軍部初建時，以譚學衡及薩鎮冰為首的同仁捐建丁汝昌祠堂，最能反映清末民初時人對譚、薩兩位海軍重臣地位的看法：

劉公島上，有一座丁提督祠堂，建於清宣統二年〔1910〕，由海軍將領薩鎮冰、譚學衡等倡議，釀全軍官佐士兵三日餉銀所得若干萬元，作為工程費用，……丁汝昌是褫職逮問的敗軍之將，在他死後十八年，貝勒載洵以親貴任海軍部大臣，譚學衡副之，起用薩鎮冰為海軍提督，統帶長江艦隊，譚、薩皆負軍中人望，載洵因他們呈請，遂疏陳甲午之役，汝昌死事實壯烈，且戰敗之咎，不在汝昌一人。廷旨：准開復原官，但沒有賜卹。所以這個丁提督祠，實不列祠典。¹¹⁴

在建立新海軍時肯定前輩為保家國而犧牲的氣節，對提振士氣固然重要，但除現實政治的考慮外，丁汝昌祠的倡議也反映譚、薩兩人對甲午戰爭，以及對丁汝昌功過的評定，都有相似的見解。而且薩鎮冰得蒙起用，未必與譚學衡的支持無關，所以兩人最少在新成立的海軍部共事之初，相知合作似乎多於派系鬥爭。不過，正因為「譚、薩皆負軍中人望」，朝廷派系自然想拉攏他們，即若要牽制薩鎮冰，便只有倚重譚學衡，相反亦然。無論如何，在海軍千瘡百孔的困境中，海軍部卻陷入了內耗不止的派系之爭，令有名望與能力的譚學衡與薩鎮冰，都不能盡展所長，這或許就是他們自身與清朝海軍最大又最典型的悲劇了。

五、勇退急流：民國以後專注廣東治水規劃

在清帝退位過渡時期的1912年初，譚學衡與唐景崇、沈家本等內閣官員主張停止辛亥革命內戰，反對袁世凱繼續對革命軍用兵。¹¹⁵在袁世凱成立北京臨時政府的初期，譚學衡於民國元年(1912)2月13日開始擔任海軍部正首領，任職期間為南北停戰及落實清室優待條例克盡己職。¹¹⁶不過，就在同年3月30日，北京政府的海軍部正式

¹¹³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頁411-12。

¹¹⁴ 高拜石：〈劉公島上弔丁祠〉，載《古春風樓瑣記》，第4集，頁117-18。

¹¹⁵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1月6日，第5版；〈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1月31日，第2版。

¹¹⁶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2月8日，第2版；〈補錄袁全權通電〉，《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2月23日，第2版。

成立。袁世凱重用閩人，任命親信劉冠雄為海軍總長，同時免去譚學衡的正首領職位，¹¹⁷擬改任他為海軍次長。¹¹⁸只是民初政事飄忽不定，他與袁世凱也有不少矛盾，便儘量與這位當權者保持距離，在海軍工作交接後，¹¹⁹即撤離官場回鄉閒居。¹²⁰不過，譚學衡的去留問題，也一度惹起當時社會議論，1912年9月17日的《大公報》便專題報導了「譚學衡將來之位置」：「袁總統現已得譚學衡電告來京，茲聞袁意擬將譚暫留府中，派充海軍顧問。將來海軍處成立之後，即派為該處總長。惟譚此次來京，對於政界頗具悲觀，未悉願就否。」¹²¹這預測是正確的，譚學衡沒有留戀權位。比起其他在袁世凱麾下營求高位的海軍同僚，他始終不甘與袁氏為伍，出處可說極為瀟灑。民國二年（1913）2月12日，譚氏因在海軍的貢獻，獲授海軍「勛三位」。¹²²在授勛前有一插曲，就是新任海軍總長劉冠雄，有意按當時正在草擬的「武員隨使分駐各國」辦法，委派「前清海軍大臣譚學衡加以海軍中將銜，任為隨駐英國使館」。¹²³以前任海軍大臣作駐外使館的武官，可謂之大材小用。如此奇怪的安排，不知建議者是何人？如是譚學衡本人，便知他想離開袁世凱的新政府愈遠愈好，好於英國避開政事紛擾；如是袁世凱政權中人所擬，則可見他們確視譚氏為眼中釘。

清末民初政治中鄉誼是極為重要的運作因素，從譚學衡掌有權力後便作粵籍官員領袖來推動政見，以及他對何璟的開復、伍連德等同鄉的支持，可見一斑。正因如此，在北京政壇失意的譚學衡，走出國家中樞之後的舞台，便自然是家鄉廣東了。民國三年（1914），廣東洪水為患，當地鄉民代表聯同旅京同鄉，由譚學衡的廣東同鄉、在晚清內閣的同僚郵傳部大臣、當時北洋政府總統府秘書長及交通銀行總經理梁士詒領銜，聯呈北京政府疏治粵省河道，至此袁世凱終於找到可妥善安置讓他不太順眼的譚學衡的最佳出處了。譚學衡旋被任命於故鄉成立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處，並於1914年11月13日起任廣東治河督辦。¹²⁴大概在梁士詒的引介下，先後聘請上海浦江浚河局總工程師海德生（August Werner Hugo von Heidenstam，1884–1966）、工程少校柯維廉（Major G. W. Olivecrona）這兩位瑞典籍工程師任治河處總工程師。¹²⁵譚學衡一如既往，任事極為認真，常親臨視事。從1915年6月開始，他率

¹¹⁷ 〈臨時大總統令〉，載《國家圖書館藏民國軍事檔案文獻初編》，第1冊，頁5。

¹¹⁸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4月2日，第2版。

¹¹⁹ 同上注，6日，第3版。

¹²⁰ 劉傳標：《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頁76。

¹²¹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9月17日，第5版。

¹²² 〈命令〉，《大公報（天津版）》，1913年2月13日，第1版。

¹²³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2年10月14日，第5版。

¹²⁴ 劉傳標：《中國近代海軍職官表》，頁149；〈命令〉，《大公報（天津版）》，1914年11月15日，第2版。

¹²⁵ 梁士詒在廣東治水中的推動引介角色，見王曙星（主編）：《江門五邑名人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一卷，「譚學衡」條（陳占標執筆），頁137–38。

領工程技術人員前赴西江河道進行勘測，並提出《西江防潦條陳》意見書。7月，東、西、北江水同時暴漲，水患重於往年，測量工作被迫停頓。當時新會天河圍堤崩決，水患嚴重。譚學衡回鄉視察，協助制訂搶修加固圍堤方案，並繼續開挖天沙新河；後又在天沙河出口處新建三孔14.5米寬的耙沖水閘，徹底解決天河圍的防洪和排澇問題。¹²⁶可是，民國政壇極端動盪，治水工程款項無著，只可調用賑濟水災的餘款作治水經費，¹²⁷有時卻倒過來要用治河的款項賑災。¹²⁸尤有甚者，治河督辦職位，與廣東水利局分局權限多有衝突，¹²⁹有關工程可說舉步為艱。譚學衡任內不少修築堤壩、水閘等工程已無法正常進行，¹³⁰繼後的督辦雖極力維持，但直到1936年，完成的工程還不到譚氏預算的五分之一。¹³¹

丙辰年(1915)十一月，譚學衡為廣東開平前輩許奇崑(1827-1892)的《尺蠖齋詩文集》寫序，難得當中留下文字，讓讀者得以一窺這位新學出身軍人對清末民初詩文潮流的看法：

詩以言志，文以載道，古有言矣。所謂志與道者，蓋言必由衷而適於有用也。世之言詩文者，論流派、爭門戶，曰漢魏、曰唐宋，囂囂焉高樹標榜，馳騁壇坫，非不欲躋於作者之堂而入其室。然非得諸山川之秀，根柢之厚，性情之真，醞釀而培養之，則其詞不邃，其味不永，所為詩文皆贗鼎耳，不足以言古也。竹湖年伯，幼貧苦，聰敏過人。授以書，輒成誦；誦之不已，遂上窮於六經諸史，而肆力於古文詩歌，盡得其精髓，釀醞而培養之者，非一日矣。通籍後供職部曹，備知政要。迨至外官八閩，政績昭卓，一以通民隱、恤民艱為念。自壯至老成，或出或處，南北往來，皆手不釋卷。所過名山大川，一一紀諸詩歌。觀其詩則遠追白、陸，近仿施、查，無流派之可言，尤不以藻繪塗飾為事，誠有真性情貫注於其間也。又於其鄉山林麓，里社橋樑，歲時禮節，風土藝業，各系以詩，名曰《鄉園夢志》。事簡詞潔，足為稗史邑乘之助，詢可傳矣。衡於詩文未窺藩籬，而是篇詩文之大致，畧得

¹²⁶ 見《百度百科》之「譚學衡」條：<http://baike.baidu.com/view/1355416.htm>，檢索日期：2015年2月26日。

¹²⁷ 〈譯電〉，《大公報(天津版)》，1915年1月15日，第2版。

¹²⁸ 〈特約路透電〉，《大公報(天津版)》，1915年7月29日，第2版。

¹²⁹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5年1月19日，第3版。

¹³⁰ 有關民初廣東水患、水利思想及譚學衡治水的簡介，見吳建新、唐元平：〈近代廣東水學、公民意識與治水體系的發端——以《籌潦彙述》為中心〉，《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6期，頁80-86。

¹³¹ 見余榮謀(修)、張啟煌(纂)：《民國開平縣志》(香港：民聲印書局，1933年)，卷二二，頁五下至六下。有關譚學衡在民初廣東治水事業的詳細研究，見譚家齊：〈未竟之業：民初廣東治河督辦譚學衡的治水計畫〉(待刊)。

其概焉！哲嗣魁卿明經，出眎原稿，并索一言，以為吮引，乃不揣謏陋而為之序。¹³²

雖然自謙不入詩文藩籬，但這篇序文罕有地表達了譚學衡對真情寫作、不拘門戶的看法，這或許反映了他厭惡派系成見與心胸廣闊的大將風範吧。在廣東治水之際，他更緊張在粵百姓的民風，積極反對廣東弛放賭禁，對其中弊害「措詞亦沉痛」。¹³³其實早在清朝行將滅亡時，譚學衡雖位處中樞，仍片刻不忘粵地民生，更對鴉片煙禍害廣東極為著急。他與當年黃埔水師學堂的同學馬伯濤、葉惠如、林贊卿等，組織「廣東省戒煙振武宗社」，積極推動禁煙宣傳與戒煙活動，受當時廣東將軍增祺（1851–1919；1909–1911年間任廣東將軍）明令表揚。¹³⁴

譚學衡六弟學夔，在清亡後任職保定軍校教育長。民國四年（1915）討袁世凱稱帝之議四起時，譚學夔南下廣東，加入龍濟光（1867–1925）的將軍府中。他同時又與譚學衡的海軍舊僚屬曹汝英，一同出任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處的副官治河提調之職，襄助其兄繁重的工作。1916年護國戰爭爆發，譚學夔與梁啟超等合力確保龍濟光獨立於袁世凱。當時駐守廣州的幾艘北洋軍艦，在譚學夔策反下投向護國軍，此應歸因於其兄譚學衡在海軍中的影響力。面對海軍的威脅，龍濟光不得不響應西南各省的獨立護國運動。不過，時任粵、桂、贛三省禁煙督辦的蔡乃煌，卻是袁世凱的死黨。4月12日，蔡為反對龍濟光獨立，邀約梁啟超的代表湯覺頓、譚學夔等，在廣州海珠會談，席間卻借機反面，刺殺了湯、譚等人。譚學衡向梁啟超等通報其弟及護國軍代表之死，電文如下：「旬日以來，吾粵危急萬狀，六舍弟夔為維護全省安謐起見，挺身出任調停，一片苦心當為各界所共見；今日在海珠會議被槍殞命，衡忽折雁行，曷勝悲痛。尚望始終維持大局，勿使全省糜爛，夔弟有靈，或可無憾也。」¹³⁵同月19日，陸榮廷、梁啟超、張鳴岐、岑春煊等人在肇慶與龍濟光達成協議：「（1）龍濟光仍留任廣東都督；（2）在肇慶設臨時都統府，以岑春煊為都督；（3）處死蔡乃煌；（4）龍濟光從速北伐討袁；（5）地方民軍在岑春煊入粵後，設法撫綏。」24日，龍濟光為了履行在肇慶達成的協議，顯示獨立反袁的意志，便先下承諾，繼續履行於26日，在廣東宣佈獨立後，即逮捕蔡乃煌，交由譚學衡在他監督下公開槍決。¹³⁶其實，此次事變得以妥善處理，在於譚學衡忍受喪弟之痛，苦心經營，才有此結果。他在5月4日的《譚學衡致各路民軍司令書》中，有如下表述：「各路民軍司令公鑒：海珠事變亡弟學夔，以任調人而飲彈殞命，至為悲痛。然經此波折，無人

¹³² 《民國開平縣志》，卷三九，頁二十下。

¹³³ 〈北京〉，《大公報（天津版）》，1915年1月4日，第5版。

¹³⁴ 王曙星：《江門五邑名人傳》，第一卷，「譚學衡」條，頁137。

¹³⁵ 高拜石：〈由蔡乃煌之死說到民五屠龍〉，載《古春風樓瑣記》，第18集，頁204。

¹³⁶ 參見〈譚學衡譚學夔兄弟與中國近代海軍〉：<http://chinesemahan.blog.163.com/blog/static/1028420342013222918785/>，檢索日期：2015年3月10日。

繼任調停，粵事益形危急。衡不得已，含淚奔走廣肇之間，疏通兩方意見，以期彼此融洽，不生誤會。所幸陸、梁兩公及龍都督，同以顧全大局為心，非如鑿柄之不相入。粵事辦法，已由雙方妥商和平了結，衡甚望各界萬勿驚疑。」¹³⁷

1916年護國戰爭廣東紛亂期間，龍濟光曾欲讓出廣東都督之位予譚學衡：「頃聞譚係粵中海軍人員所舉，而陸軍中亦有一部份舉譚，龍亦讓譚。惟譚見黨派之分爭，決意不肯擔任。故廣東都督一席，刻下仍屬之龍濟光。」¹³⁸此外，民國海軍因參與廣東抗袁運動而獨立，事後海軍須安排回歸北洋中央政府管轄，此時有「當局者」欲邀海軍名宿程璧光、薩鎮冰或譚學衡等重出為海軍總長。¹³⁹1916年末，廣東省長朱慶瀾(字志樵，1874-1941)因與廣東督軍衝突而「辭職，並薦譚學衡以自代」，¹⁴⁰此時廣東各界對此也大表支持。¹⁴¹1917年4月，廣州有拆卸老城城垣計劃，因遷拆賠償及以拆卸磚石填河等問題爭議不少，省長朱慶瀾「以治河督辦譚學衡實心辦事，粵人久為敬仰，將來即擬推譚主持其事」。¹⁴²另一方面，在袁世凱倒台後，於1917年7月6日至1918年10月10日期間任北洋政府代理大總統的，就是譚學衡於清末供職貴胄學堂時的舊上司馮國璋。馮氏於譚學衡赴京時多次邀約他私下詳談時局及廣東情況，¹⁴³故此譚學衡要憑相關人脈重回北京權力核心，或在廣東擁兵自雄，也絕非難事。不過，譚學衡喪弟以後，可能真是「忽折雁行」，1917年10月30日又因母喪之故，請去治河職務，但北洋政府只許他休假百日。¹⁴⁴此後他對政治及權位更心灰意冷，一意於廣東河務以及奉天的林業發展等有惠國計民生的「實業」上。¹⁴⁵

譚學衡任職治河督辦期間，一直受疾病困擾，1915年及1917年更兩度因病勢沉重而請假。1915年11月首次請假時，譚學衡甚至因頭暈頑疾而請求北京另委督辦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北洋政府不准簡員接替，兩次都是只給譚學衡一月的休假。¹⁴⁶假

¹³⁷ 〈廣東〉，《大公報(天津版)》，1916年5月4日，第7版。

¹³⁸ 〈要聞一〉，《大公報(天津版)》，1916年4月15日，第3版。

¹³⁹ 〈要聞二〉，《大公報(天津版)》，1916年8月15日，第6版；8月22日，第6版。

¹⁴⁰ 同上注，11月1日，第6版。

¹⁴¹ 〈特約路透電〉，《大公報(天津版)》，1916年11月22日，第2版；〈特約路透電〉，《大公報(天津版)》，1916年11月24日，第2版。

¹⁴² 〈廣東〉，《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4月26日，第6版。

¹⁴³ 〈公府要聞麟爪〉，《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10月13日，第3版；〈粵事要聞彙誌〉，《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11月12日，第2版；〈昨日之時局問題〉，《大公報(天津版)》，1917年12月22日，第2版；〈譚學衡志在實業〉，《大公報(天津版)》，1918年1月5日，第3版。

¹⁴⁴ 段琪瑞：《政府公報》，第643號(1917年10月30日)，頁29。

¹⁴⁵ 〈譚學衡志在實業〉，《大公報(天津版)》，1918年1月5日，第3版。

¹⁴⁶ 〈大總統批令(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譚學衡呈病勢沉重懇請簡員接替文並批令〉，陸徵祥：《政府公報》，第1274期(1915年11月21日)，頁17-18；〈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譚學衡呈舊恙稍愈呈請銷假文並批令(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六

若他不是肩負此等艱巨任務，能獲家居休養機會，說不定可樂享天年。事實上，譚學衡縱使扶病，還是堅持踏勘廣東全省，而且常要到北京述職，舟車勞頓令他健康進一步受損。1919年他終因治河事宜，以及來往廣東與北京間繁劇的公務而病倒，更在是年7月21日病逝於故鄉新會的北街醫院，以四十八歲的壯年辭世，¹⁴⁷來不及在民國時代再展拳腳。8月10日，譚學衡副手治河提調曹汝英，正式接任其治河督辦遺缺。¹⁴⁸1919年9月26日，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譚學衡晚清內閣的同僚徐世昌（1918年10月10日至1922年6月2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發出《大總統令》，總結譚學衡一生對中國的功勳，追贈他為海軍中將：「督辦廣東治河事宜勳三位譚學衡，前在海軍部任內，悉心規畫，懋著勳猷，翊贊共和，厥功尤偉。嗣經管理廣東河務，宣力頻年，克勤厥職。茲聞溘逝，悼惜殊深。譚學衡著追贈海軍中將，給予治喪費二千元，並由院部從優議卹，以示篤念勳勤至意。此令。」¹⁴⁹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靳雲鵬和海軍部部長劉冠雄，便按此令跟進對譚學衡應致的卹典，於11月1日以如下呈文回覆總統府：

因奉此查文官給卹事項，如遇職位較崇、聞望素著之員，歷經參照成案，給與卹典，追贈海軍中將。譚學衡翊贊共和，厥功尤偉，擬請援照成案，派員致祭，並將生平事蹟，宣付國史立傳，以示優異。又海軍部查《海軍瞻卹令》草案第十五條第四表丁項，從優進一級，照上將積勞病故例，給予一次卹金七百元。並暫依《海軍給予令》草案第四表，照上等官佐例，給予殯殮費八百元，以慰忠靈。所有遵議追贈海軍中將譚學衡從優給卹各緣由，理合會呈，伏候鈞裁。¹⁵⁰

可是這建議似乎在南方護法軍政府與北洋政府對峙中未有切實執行，各方記錄固未見譚氏已按院部之議「優進一級」為海軍上將，國史中也未見有為這位「聞望素著」的重臣立傳。廉幹而又四方稱美的譚學衡，在紛擾的民初政局中本可作凝聚南北共識的關鍵人物，但「時運不齊」，在民國最需要他的時候竟英年早逝，落得幾乎被歷史遺忘的下場。

〔上接頁149〕

日)》，陸徵祥：《政府公報》，第1308期（1915年12月26日），頁27；〈大總統令：大總統指令第一千五百四號（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十八日）：令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譚學衡：呈舊病復發請給假調治由〉，段祺瑞：《政府公報》，第602期（1917年9月18日），頁9。

¹⁴⁷ 王曙星：《江門五邑名人傳》，第一卷，「譚學衡」條，頁138；《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處報告書》，第3期「北江改良計畫」（廣州：督辦廣東治河事宜處，1919年），頁1-3。另見〈譚學衡鄉先生事略〉，《棠下僑刊》創刊號（1987年9月），頁26。

¹⁴⁸ 〈軍政府派兩廣治河督辦〉，《大公報（天津版）》，1919年8月9日，第3版。

¹⁴⁹ 〈命令〉，《大公報（天津版）》，1919年9月27日，第2版。

¹⁵⁰ 《政府公報》，第1341號（1919年11月1日），頁7。

譚學衡父親譚國恩共有六子：¹⁵¹長子學周(字友召)，成茂才，清末任法部主事；次子學裴(字次度)，以第八十名孝廉舉於鄉，宣統二年任直隸試用道，¹⁵²約於同年至辛亥革命期間(1910-1911)任陸軍部呢革公司總理；¹⁵³三子學衡；四子學慈，黃埔水師學堂第三屆駕駛班學員，曾職北洋海軍，清末時職新寧及柯城知縣，後任中國銀行行長；五子學徐；六子學夔，乃是過繼的「嗣男」。一門文武鼎盛，是清末民初廣東新會的望族。譚學衡後人散居廣州、新會、梧州、香港等地，知見兒子兩名：譚葆端，民國時任古巴公使兼海地公使；譚葆慎，任駐英國倫敦總領使。¹⁵⁴娶妻何氏，妻舅為何聘之。¹⁵⁵此外，譚學衡原有一段聘娶其父好友、香港商人蔡子翼之妹的姻緣。譚國恩1896年的〈蔡子翼索寄近詩久未有作走筆為此贈之(丙申)〉一詩中，便對蔡氏抱歉：「葭玉緣疏應諒我(衡兒頗為令叔所器，欲以令妹妻之，為算家所誤)。」¹⁵⁶雖婚嫁不成，兩家仍是極為友好的。

六、總結

現見不少有關譚學衡的傳記資料，不是過於簡略就是錯漏百出，皆因沒有將他生平的片段綜合起來，對其父兄及友好之生平著作又不聞不問，以致這位在清末民初風雲變幻中有一定建樹的軍政大員，得不到史家應有的重視。當然，清末民初史事紛陳，公私史料仍有待更廣泛與深入的鉤沉，而本文多處也展示我們掌握的譚學衡生平事蹟，仍有不少有待核實與考證的地方，需要進一步探索與澄清。

雖然譚氏在海軍的實戰履歷不及同袍薩鎮冰，在民國建立與鞏固的過程中，貢獻也不如同鄉程璧光，但在清朝末年軍事積貧積弱、財政又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本來就無馳騁疆場、為國爭光的機會與迫切需要，海軍駕駛出身的譚學衡，仍能在清亡前最艱難的時刻，於海軍教育及海軍現代化等要務中立剛陳紀、殫精竭慮，籌劃了一個比北洋艦隊時期更詳盡更務實的發展藍圖，為海軍的長遠發展掌舵；並且努力調和海軍中閩、粵兩系的明爭暗鬥，在民國建立時出處瀟灑，此後全心督辦廣東水利，一以推動實業為念，也不在舊同僚上位後於政治上謀取自身權位。可惜天不假年，此位晚清海軍重臣未能對中國的海權發展，以及廣東乃至整個中國的水利工程，作出更宏偉與長久的貢獻。

¹⁵¹ 譚國恩：《燕都投贈錄》，頁三八。

¹⁵² 同上注，頁38、40。

¹⁵³ 〈要聞〉，《大公報(天津版)》，1911年5月6日，第2版。

¹⁵⁴ 凌常卿：〈平樂名人：譚國恩及其族人〉，轉引自《平樂發布》(2018年1月30日)：<http://mp.weixin.qq.com/s/UYJPUo9B9qVUte5QavA8Pg>，檢索日期：2018年3月15日。譚國恩子孫的排序與入嗣證據，出自民國六年(1917)四月所立的譚國恩墓碑。

¹⁵⁵ 〈廣東〉，《大公報(天津版)》，1914年12月16日，第9版。

¹⁵⁶ 譚國恩：《寫趣軒續稿》，卷一，頁410。



辛亥革命前的譚學衡，照片原刊 *Far Eastern Review*



清末海軍重臣譚學衡(1871–1919)生平考論

(提要)

譚家齊

譚學衡(1871–1919)是甲午戰敗後中國海軍重建的靈魂人物之一，在清宣統帝遜位詔上，以內閣署海軍大臣名義副署，見證中國千年帝制的結束。可是，當其海軍及內閣同僚都被廣為研究或傳頌，他卻幾乎在中國海軍史及民國開國史的著述中失去蹤影，至今亦未有一篇完整的傳記研究，交代此歷史轉折時期重要人物的生平與貢獻。本文利用現存的海軍資料、廣東鄉邦文獻、當時報刊資料及譚氏家族著述，撰寫較完整的譚學衡傳記，以見他在清末海軍重建和清朝結束過程中的地位，以及他可能被遺忘與低估的貢獻。

關鍵詞： 譚學衡 晚清海軍 甲午戰爭 皇族內閣 薩鎮冰

A Biographical Study on Tan Xueheng, the Last Naval Minister of the Qing Empire

(Abstract)

Tam Ka-chai

Tan Xueheng (1871–1919)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to Republican China. He was not only a key leader to the rebuilding of the naval power of the Qing Empire after the catastrophic defeat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but also a cabinet member who co-signed as the Acting Naval Minister on the abdication edict of the last Qing emperor, so he ha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final phrase of the imperial system of China. While many of his colleagues of the Imperial Navy and of the Qing cabinet have been widely introduced and studied by modern scholars of the late Qing, Tan almost disappeared 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late Qing history as well as the specialized history of the Qing navy. There is yet no comprehensive biography introducing this significant but low-profiled player in this critical transitional period of Chinese history. Through a critical textual study of the naval archives of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s, the local historical works of Guangdong, newspaper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works of members of the Tan family,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life of Tan Xueheng, and, thus, demonstrates his underestimated contributions to the rebuilding of the Chinese navy and his overlooked roles in the termin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Tan Xueheng late Qing navy Sino-Japanese War (1894–1895)
the royal cabinet Sa Zhenbing